



□ 江林昌

三星堆文化揭示了什么

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以及坑内出土的500余件重要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次发现需要与90年来成都平原的其他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综合起来考虑，才能较好地把握三星堆文化独特的内涵风貌，并判断其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逐步揭开的神秘面纱

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被发现了。1933年，当时华西大学的葛维汉教授率领其助手到现场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发掘。此后，四川大学冯汉骥先生也开展过一些调查。但由于条件所限，新中国成立前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文化属性，未能取得明确认识。

1980年代初，四川省考古所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发现了18座房屋基址，以及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考古工作者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这些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类型在成都平原还有广泛的分布，因此发掘报告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6年的再次发掘，发现了两个神奇的祭祀坑，坑内出土了大型青铜神像、巨型青铜神树、双眼如电筒伸出的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以及大量的玉器、象牙等等。这些奇特造型的器物，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其他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因而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现的2个祭祀坑在形制与朝向方面基本一致，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南部的东台地上。坑内出土的500余件器物，除与1986年相同者之外，还有大型的青铜大口尊、巨型的青铜面具、眼部有彩绘的青铜头像，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还有玉琮、象牙雕塑等等。

目前考古工作者对6个祭祀坑中的4个坑作了碳14测年，获得的年代数据为距今3200—3000年之间，可以确定为商代晚期。

除了这8个祭祀坑之外，3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三星堆古城墙、宫殿区和公共墓地。在这个中心古城周边，还发现了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仁胜村墓地等。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中心所在。一个曾经辉煌的古国文明，经过90年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神话传说原来是真实历史

李白《蜀道难》有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过去，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古蜀国的历史一直处于神话传说之中。如扬雄《蜀王本纪》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

代名曰柏濩，其后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这是关于蜀国先祖最早的神话传说。其名号“蚕丛”“柏濩”“鱼凫”，及其后的“薄泽”“望帝”“杜鹃”“鳖灵”等先祖名号，都与动植物图腾有关。说明当时的蜀人仍然处于蒙昧野蛮时期。文献记载的蜀国古史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之中。

然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以及成都平原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这些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背后隐藏的古蜀国文明的真实面貌。

考古工作者在这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提取的测样中发现了蚕丝蛋白的成分。这证明早在商代，古蜀国的先民已经从事蚕桑丝织业了，而这种生产传统应该起源很早。上述古蜀先民的第一代祖先“蚕丛”正反映了这一事实。蚕吃桑叶吐丝，可以为人制丝成衣，自然成了先民的保护神。而且，蚕产卵、成蛹、化茧、最后又自藏的过程，与人类生殖、养育、成长、去世的过程类似。在巫术互渗观念的支配下，古蜀先民崇拜蚕桑，相信蚕虫能够沟通天地神灵，保护人类命运，因而他们将本部族的起源始祖，神化为“蚕丛”图腾。

成都平原本是鱼米之乡。农耕渔猎生产生活，首先需要阳光雨露。因此，古蜀先民有崇拜太阳神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中有大量反映太阳崇拜的主题，如太阳青铜神树、青铜纵目太阳神面具，以及太阳纹金箔。古蜀先民还以此为基础，将太阳神动物化为空中的飞鸟与水中的游鱼。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有青铜鸟头柄的勺子、青铜树神鸟、青铜鱼纹器、黄金鱼饰片、鱼纹金箔等等，均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动物化太阳神的崇拜。而古蜀先祖中的“鱼凫”“鳖灵”“开明”等神话名号，也都在这些三星堆器物中得到了证实。现如今，成都平原还有“鱼凫村”古村名，可见这种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影响。

90年来，成都地区发现的重要考古遗址除三星堆外，还有宝墩遗址、金沙遗址、桂圆桥遗址、十二桥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竹瓦街遗址、城坝遗址等等。考古工作者对成都地区的考古遗址遗物进行了长期的分析研究、综合判断。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桂圆桥文化： 距今5100—4700年 宝墩文化： 距今4600—4000年	} 相当于五帝时代
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000年，相当于夏商时代	
十二桥文化：距今3000—26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其中宝墩文化、桂圆桥文化已显示了文明的起源，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已进入了文明阶段。这应该就是古蜀文明真实历史。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出土文物的发掘研究，使得文献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的神秘面纱被逐层揭开，古蜀先民所创造的文明古国历史，终于可以让21世纪的我们可见、可触、可摸了。

神奇花朵生长在多元文化土壤上

近100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与聚落形态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经历了五帝时代的“多元并行”、夏商周的“多元一体”、秦汉以后的“多元一统”三大发展阶段。成都地区由于四面高山重林环绕，山谷大河奔腾，这些山高水险使得该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发掘表明，三星堆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是自成序列的文化。学者们因此称这支文化为“早期巴蜀文化”。

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中，成都地区“早期巴蜀文化”的特色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其差异性是最大的。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广大游客，一见到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及其所出的文物，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称三星堆文化为中华古代文化园里的奇花异朵的主要原因。

创造三星堆奇花异朵的主体，自然是古蜀国的先民，但这并不排除古蜀国先民与其他地区交往的可能。李白所说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不过是诗人的夸张而已。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黄帝部族的一个分支昌意族“降居若水”，与蜀山女婚姻。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在五帝时代已经传入成都平原，与土著文化融合了。文献记载又说，蜀王与夏王同为中原颛顼帝之后，这又反映了夏文化、蜀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三星堆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些陶器特征“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夏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

到了商周时代，古蜀国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更是增进了联系，李学勤先生曾在《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一文中指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核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再经淮河至长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长江三峡传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

以上现象表明，三星堆文化首先是在古蜀文明这块特殊土壤里生根、发芽、生长而绽放的奇花异朵；同时这朵奇葩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阳光雨露，并因此而显得格外璀璨耀眼。三星堆文化的地方主体性，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再次表明了中华文明是多样性、丰富性与融合性、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因此，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总特征。

从考古看文明



（上接3版）
在这些具体工作方面，习总书记深入浅出地举实例帮助我们分析，鼓励我们不断进行探索。

采访组：请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习近平同志三次到丽水调研的特点，以及对丽水发展的重要意义。

谢力群：从2002年第一次赴丽水调研，到2004年第三次调研，习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把老、少、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作为一个关键点来抓。那几年，有一部反响比较大的电影，是张艺谋拍的《一个都不能少》，习总书记还曾经风趣地引用这个片名说：扶贫攻坚，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这种执着，这种严谨，持续不断地体现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他给了丽水以及欠发达地区一系列扶持政策和举措，比如“百亿帮扶”工程，瞄准山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些薄弱环节，拿出来的财力重点用在亟待上马的帮扶项目上，建设欠发达地区的路、电、水、环保等基础设施。根据浙江的大多数欠发达地区位于山区和海岛的实际，又推出了“山海协作工程”，全省发达地区的县市对口

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在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着力把欠发达地区作为新的增长点。

在发展理念的层面，习总书记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在他的指导下，当时的丽水作为最早发展生态经济的地区之一，通过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出了不少好典型，形成了一批发展成果，初步做到了既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让老百姓富起来的良性循环。

习总书记“下山扶贫”的工作思路，非常富有开创性。在特别偏远的大山深处，即使花巨资通了公路、电和其他基础设施，也未必能很好地解决发展问题，更不能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而让群众下山融入县域经济，则兼顾了生态和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山区、贫困地区的年轻一代，也可以从山里走出来，长见识、增才干，融入外面的社会，有条件再反哺乡村。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既是经济发展的整治和示范，也是环境保护的整治和示范，在丽水得到充分的落实，这也使丽水后来顺利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接轨。习总书记“小县大城关”的发展思路，我们

一直在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探索新模式，在一个大县中，发展多个中心镇，形成集聚效应，大大带动了经济发展和就业，也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采访组：您2004年调任省审计厅厅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审计工作都有哪些指导。

谢力群：习总书记很重视审计工作，始终把它作为党和政府规范财经纪律和反腐倡廉的重要工具。他在抓党风廉政建设期间和处理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都比较注重用审计的工具解决问题。

比如，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以后，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派出审计组，审查出了很多问题，为之后的调查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审计工作开展之后，习总书记多次亲自听汇报，并认真进行指导。这就说明，他非常重视用审计的手段遏制腐败，发挥审计规范财经的重要作用。浙江省大凡出现经济领域腐败的苗头，他也都尽可能地用审计作为先行介入的手段解决，经审计确实有问题的，该处理就处理，该移送就移送，没有问题的，就澄清是非。



纵观东汉政权，相继有刘秀开创的光武中兴、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坦开创的明章之治、汉和帝刘肇开创的永元之隆，延续了80年的长盛时期。然而，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东汉的历任帝王已无法同汉和帝刘肇相比，都难以解决权力在外戚、宦官之间轮替纠缠的问题，东汉政权就在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擅权中日薄西山，一直到公元220年灭亡。

其中，尤以东汉后期桓帝和灵帝的相继登场，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倾颓。

桓帝宠信宦官让贤者远离

公元146年，汉桓帝刘志即位，梁太后临朝听政，外戚梁冀继续掌握大权。上任之初，刘志还是有所作为的。史载梁冀的擅权劣迹甚多，像汉和帝刘肇联合宦官诛灭外戚一样，刘志也联合宦官诛灭了梁冀及其党羽，没收了梁冀的财产。当时朝廷上下欢呼雀跃，“百姓莫不称庆”“天下想望异政”。

的确，东汉扭转积弊的历史机遇眼看就掌握在刘志手里，上下把实现善政的良愿寄托在刘志身上。但是，良愿很难成真，刘志不是汉和帝刘肇，他只是个玩主而已。从根本上说，两位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就决定了他们的结局迥异。毕竟，刘肇是汉章帝自己立为太子的，着眼的是为江山社稷选接班人，越贤能越好。而刘志，是外戚确立的接班人，则是越庸弱越好。历史上，凡是外戚、宦官或权臣专权之时所选出的接班人，基本都是立足于造愚或不肖，为的是便于自己擅权，结果就会导致政权加速倾颓。在这个意义上，寄望这些庸弱之主起振朝纲，廓清政治，不太可能。

刘肇自诛灭外戚后便亲理政事，早起临朝，夜批奏章，十分勤政。而刘志对政事不太感兴趣，诛灭梁冀也只是不想有人压着自己，以方便自己纵情使性而已。当时，刘志即封五位宦官为侯，时称“五侯”。由此，原本掌握在外戚手中的大权，又落入了宦官手中。史称“五侯乞食炊，倾动内外”。对于刘志来说，梁冀与五侯相比，就在于前者不听自己的，而宦官听自己的。

但对于国家来说，宦官擅权与外戚擅权，危害都是一样的，其劣迹也是罄竹难书。比如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的奴仆和宾客，在济北国附近仗势公开抢劫过往行人。济北国宰相滕延乘公执法，把他们逮捕并诛杀，可谓大快人心。但侯览、段珪立马向桓帝告状，桓帝便把滕延召回洛阳，治罪免官。桓帝如此偏袒宦官，致使宦官更加任权使性。面对如此局势，那些洞彻时势的贤才，即便桓帝征诏，礼仪备至，便也拒绝为官。当时汝南郡人魏桓说的一番话，很令人警醒。他说，当官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然而，“今后官数千，其可损乎？厖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对于魏桓来说，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当官无益，便隐身不出。

在位的官员，也总想找机会归隐。比如大将军皇甫规被重新受命为度辽将军之时，因为自己身居高位，怕惹祸事，就想谋求退避，数次上书称病要求辞职，桓帝不批准。正好有朋友灵枢运回故乡安葬，皇甫规有意越界迎接，然后派宾客秘密告诉并州刺史胡芳，让他检举弹劾。没想到胡芳不上当，说皇甫规是想早日脱离官场，“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中）此子计耶！”为了不当官，不惜自己诬陷自己，亦可谓千古

东汉政权是如何走向衰亡的（上）

□ 吴小乔

奇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桓帝时代，政风污浊，贤能失望。

灵帝治下的“党锢之祸”

桓帝36岁时便在庸碌无为中死去，壮年而夭，又无子嗣，只能从一众王侯中选立继任者，12岁的刘宏遂被选中，窦太后临朝听政。刘宏本属于姓子里拔将军一类，怎奈是一个更庸弱的人。当时，窦太后把大事小情全部委任给大臣陈蕃，陈蕃和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他们看到宦官专节、王甫等把持朝政，便谋划清除。

他们多次上书窦太后，但窦太后犹豫不决。后来借用一起案件，牵连到曹节、王甫等人，窦太后终于决心予以逮捕。可是这天窦武在休假，而负责主管奏章的宦官私拆奏章，知晓了行动，于是宦官朱瑁等连夜召集17人歃血为盟，合谋诛杀窦武等人。他们假称陈蕃、窦武奏请皇太后要废黜皇帝，挟持儿皇帝刘宏杀死陈蕃、窦武，迁窦太后到南宫。凡是两人推荐任用的官员全部免职，一批宦官封侯，史称“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

宦官们得手后，变本加厉，把持朝政，对李膺、范滂等贤士，一律指控为要推翻朝廷的党人而予以打压，共牵连六七百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是第二次，比桓帝后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对东汉政权的危害更为深重。“党锢之祸”的结果，就是权力平衡被打破，宦官集团弄权，又缺少清流士大夫的牵制，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直接激起了民变。

工作相关的各项专业知识都钻进去认真学习一遍。省委书记的工作，涉及全省发展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每项工作他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成为内行，这是我们都敬佩的。

这让我想起他第一次来丽水调研的情景，当时他就已经对丽水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以及发展现状有了很深入和系统的了解。我到省审计厅工作后，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他和我谈起来，全都是很内行的话，而且都能说到关键点上。

我想，这和习总书记平时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有关。他在下面调研的时候，每天晚上不是找干部谈话就是在翻看县志和相关资料。我们在地方工作多年，对当地的了解，有些方面还没有他一个晚上系统学习之后了解得深入。而且，那么厚的一本书，他能迅速找到重点内容去看。说实话，跑了一天的路，调研了一天，见了很多，讲了很多话，晚上上该好好休息了，但他还要拿起一本书熬夜学习。作为我来说，真的缺乏这种劲头。就如同现在年轻人开玩笑说：“有一种人，实在是没法追赶上他，因为他不但比你优秀，还比你更努力。”